

新书掠影

米沃什是享誉世界文坛的波兰作家、诗人。在这本传记巨作中，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米沃什本人及其所处时代的生动图景，同时也提供了理解其作品的丰富语境。

《米沃什传》
[波兰]安杰伊·弗劳瑞塞克 著
乌兰 李江颐 等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5月出版

在本书作者看来，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独特优势，是市场经济制度和职业化的文官制度的有机结合——如何最终实现市场与政府的合理分工，既使人民各得其所，又促进总体经济的增长。

《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
李晓鹏 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23年6月出版

本书邀请22位作家，根据22位摄影师拍摄的有关城市的影像，自由地进行更拓展性的深度表述，是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的一份温情又不乏思考的记录，唤醒、再现、重写了一种植根于城市经验的时代缩影。

《消逝与眷恋》
许雪峰 吕正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3年5月出版

孤独似乎成为了现代人逃不掉的一种情绪。本书为我们展现了历史上不同人物对独处生活经历的种种理解。独处关注内在和外在，关注自我和世界，而孤独的解药就是独处的艺术。

《孤独不算烦恼》
[英]扎克·西格 编著
丁林鹏 译
中译出版社
2023年6月出版

本书从中高净值家庭及人群的行为模式、金融资产配置、商业保险配置等六个方面展开研究，力图能够全面而精准地对我国中高净值家庭及人群进行全景式的分析。

《中高净值家庭财富管理报告》
顾佳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年3月出版

书人茶话

爱书到最后，迷的是装帧

周洋

一本好书，当然是外在和内在、内容与形式的珠联璧合。书籍装帧，就专司这外在形式的审美体验，对应着国际上通行的“book design”一词，也即书籍设计。在现实中，往往会碰到这样的吊诡之处，一本书的内容早已沉入记忆的湖底，但书的装帧却成为岁月长河里的航标灯，勾起我们共同的阅读记忆。这让我想起董桥先生的一段话：“书痴先是只买要读的书，继而搜买想读的书，再则立心读遍存书，最后捧回的全是些装帧美丽的老书，就算读不懂书中的绝种文字也硬要买来玩赏。”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最后，迷的是装帧”。

书籍装帧就是戴着镣铐在跳舞

书籍装帧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封面设计，因为封面关系到读者接触一本书时留下的第一印象。出版家范用先生在其自选集《叶雨书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开篇就写道：“我每拿到一本新书，先欣赏封面。看设计新颖的封面，是一种享受；我称之为‘第一享受’。”

范用曾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三联书店总经理，是一位酷爱装帧设计的出版界前辈，常常亲自动手为图书设计封面。因为是在管理工作之余做的设计，所以署名“叶雨”，乃业余爱好之谓也。这本《叶雨书衣》全彩印刷，收录了范用为67本书设计的封面书影，以及与之这些书出版发行相关的掌故轶事，其中不乏《随想录》《乡土中国》《傅译传记五种》等家喻户晓的好书。范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他认为书装设计师一定要看书、爱书、懂书，只有读懂书的内容，把握书的性格，深刻理解文本，才能设计出好的作品。

范用的这一理念直接影响了他的弟子——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宁成春。年届八旬的宁先生设计过1500多种书影，获奖无数。他谨记范用的教诲，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说：“书籍装帧就是戴着镣铐在跳舞。那个镣铐就是书的文本。有了限制才有创作的自由。”《一个人的书籍设计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就是宁成春的作品集，全书通过“铅印时代”“三联风格”“素以为绚”三个部分呈现了他60年的设计历程。其中，他把《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的装帧作为一个经典案例来阐发，纯黑底色的封面给人过目不忘的印象，堪称秀外慧中的精品。那一年，

《叶雨书衣》
范用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一个人的书籍设计史》
宁成春 编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鲁迅书衣录》
刘运峰 编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黄裳书影录》
周立民 编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他从作者陆健东处拿到书稿后，一个猛子扎进文字的海洋，越读越压抑，越压抑越有创作的冲动，开始调用各种设计元素放大这种情绪；用黑色作底，从目录上提取文字，密集地堆砌在封面上方，字与字之间的距离逼仄且紧凑。他还一瞥一眼中一张全家福里的陈寅恪，双手攥着拐杖，眼睛虽已失明，却清亮有光。“那种坚毅的眼神很打动我。”在宁成春看来，这就是晚年陈寅恪精神面貌的集中呈现。他特意把“20”设计成阿拉伯数字，因为陈寅恪的经历“有中有洋”，既爱吃牛奶面包，又爱穿长袍马褂。而且“20”比汉字“二十”更能传达一种速度感，喻示着20年只在弹指一挥间。如此用心良苦的装帧设计，与书的内容相映成辉，共同成就一部当代经典。

如果我们再把目光放得久远一些，就会发现，范用、宁成春基于书的内容去设计装帧的思想可谓由来有自。在20世纪初，现代出版物，彼时也称洋装书，刚刚进入中国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就主张形与魂相融合，大胆采用“拿来主义”，将不同的文化传统融会贯通，刻有设计师“精神内核”的独特表达就会体现在书籍装帧上。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最早的书籍装帧家，他不仅亲自操刀参与设计60多种图书的封面，而且首开邀请画家为书封绘画的先河。由刘运峰编著的《鲁迅书衣录》(九州出版社出版)，收录了鲁迅著作、翻译、辑校、汇编以及鲁迅研究相关的图书书影凡146种。一册在手，可以全方位领略鲁迅与书籍装帧的不解之缘。

且看民国时的青年美术家陶元庆为小说集《彷徨》设计的封面：橙红的底色，

直直的线条，勾画出戴尖顶帽子的三个人呆坐椅上，面对着一轮圆而不算太圆、颤颤巍巍的深蓝色太阳，于百无聊赖中晃悠着双腿。众所周知，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是他自己设计的封面，成书后反响甚佳。《彷徨》是先生的第二部小说集，收录《祝福》《在酒楼上》《伤逝》等重要作品，自然对装帧设计者寄予厚望。值得庆幸的是，鲁迅对陶元庆的设计方案大加赞赏。他在信中说：“《彷徨》的封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但听说第二版的颜色有些不对了，这使我很不舒服。”并表示“太阳画得极好”。

书籍装帧最考验设计师的驾驭能力

鲁迅对青年艺术家的信任、包容让人感佩，陶元庆敢于坚持自己的创作主张，同样令人赞叹。但如果把这样的情形理解为书籍装帧设计的日常，则不免太浪漫了。在《书装话》(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装帧设计名家张守义先生的真知灼见。他把书籍装帧比作“囚笼艺术”，不同于油画、水墨、版画，也迥异于苏绣、紫砂、陶瓷等工艺品，既要与书的内容相应和，又要受限于方寸之间的图书封面。最“螺蛳壳里做道场”丝毫不为过，说是考验设计师的驾驭和平衡能力。

文和武向来是一对矛盾。文人气质浓郁的出版社要出版武侠小说，装帧设计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才能把两种不同的调性融为一体。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硬是让宁成春琢磨出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翻开《三联书店书衣

500帧(1931—200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可以看到该社1994年出版的全套金庸小说的书影。这是中国内地第一次出版金庸的整套小说。当时街头巷尾的书摊上充斥着盗版的武侠作品，封面多是刀光剑影的武打场面，轻浮而又低俗。宁成春通过深入研读金庸小说，发现金庸本人其实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钻研很深，许多武侠故事都能找到部分历史依据。他决定在封面上凸显这种历史氛围，遂找来不同朝代的绘画作品，与小说发生的时代背景相对应，比如《书剑恩仇录》用的是清代郎世宁的《弘历哨鹿图》，《雪山飞狐》用的是明朝戴进的《雪景山水图》。选取古画的局部印在封面醒目位置，书名则用潇洒飘逸的中国行书字体来书写。这个设计思路让武侠小说增加了文化积淀和历史厚重感，与三联的人文风格相契合，成为书作者、出版方和广大读者皆大欢喜的一套优秀读物。

装帧的背后是耐人寻味的书人事事

欣赏品鉴书籍装帧艺术，带给我们视觉上的享受。装帧之美和内容之美的高度统一，也让一本图书在阅读价值之外，更增添了保存和收藏的价值。但这还不是我们为装帧着迷的全部缘由。在装帧的背后，往往有着耐人寻味的书人事事，向我们诉说着鲜为人知的一段书缘佳话。或许，这才是装帧之所以令人着迷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在黄裳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周立民广泛搜罗黄裳生前身后各类文集、选集共94部书的封面书影，编写成《黄裳

书影录》(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对于喜爱黄裳文章的书迷来说，自是难得的幸事。翻阅欣赏书影之余，发现书前序言记述了一件颇为有趣的书林轶事。黄裳的第一本书《锦帆集》，是巴金先生慧眼识珠，将之编入“中华文艺丛刊”，于1946年11月出版。因印量极少，坊间难得一见。陈子善先生也曾苦苦寻觅《锦帆集》初版本无果，辗转得到一册香港印制的版本，开本比内地版本大了一号。他拿去请黄裳签名。谁知，黄裳随手一翻，即发现李鬼不是李逵，瞪了陈子善一眼说：“这是港商盗印的！”但碍于情面，还是签了“黄裳”两字，上款和铃印则一概全无。后来子善先生几经周折得到了真正的初版本，还是已故香港藏书家方宽烈先生的旧藏，再拿去请黄先生签名。这回他心情大好，挥笔写下长跋：“此为我平生著作始刊之书，绝少见。子善兄得之香港，幸事也。黄裳 甲申三月”在一般人看来，同为《锦帆集》，两本书的内容别无二致，不过是装帧上略有差别，何必如此区别对待。但黄裳有自己的坚持，不同的装帧就是不同的版本，而版权问题无疑关涉到一个书作者的尊严。不得不承认，老一辈爱书人就是性情中人，既有一份难得的率真与纯粹，也有人际交往中的分寸感和边界意识，实在值得钦佩。

宁成春为文博大家王世襄先生的代表作《明式家具研究》设计装帧，其精妙构思的背后也有动人的故事在其中。该书封面除去书名，并排放置了两把椅子，一边是明代特色的官帽椅，一边是手绘的木椅线图。原来，王世襄潜心文物收藏研究如痴如醉，家中事务尽交夫人袁荃猷一人操持，写作《明式家具研究》更是耗费大量心血。袁荃猷协助他收集资料，绘制家具线图，无怨无悔，一力成全，正是“阴阳相谐纵横，画到西窗月落时”。可惜书未出版，袁荃猷神归道山。这本书的成书过程，见证了王世襄和袁荃猷相濡以沫的真挚感情。设计师在封面右侧放的是“紫檀扇形南官帽椅”实物图，这是王世襄最喜欢的一把椅子；另一侧放袁荃猷绘制的椅子线图，代表袁荃猷的默默付出。一实一虚，琴瑟和鸣。书成人已逝，阴阳两相隔。再加上一束阳光洒在线图上，是对幕后奉献者的致敬，也暗喻着这份爱情地老天荒。

爱书到最后，迷的是装帧。确切地说，是迷恋装帧之上所承载的艺术魅力和恒久的人文精神。董桥先生所言不虚也。

前沿揽胜

仰望数据科学的星空

项亦子

“数据是21世纪的石油，而分析则是内燃机。”这是Gartner研究院高级副总裁彼得·桑德加在一次报告上的讲话观点。没有内燃机，石油也只是埋在地下的一堆烃化物；没有分析，数据也就是磁盘中的二进制。数据分析作为日益重要的科学领域，成为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基石。如今大红大紫的人工智能ChatGPT其基本算法来自于深度学习，而强化学习，而ChatGPT的训练则是用了大数据和大算力。科学家司马贺曾给出如下定义：“如果一个系统能够通过执行某个过程改进它的性能，这就是学习。”而所谓“训练”则是为了让人工智能归纳出模型而提供大量的数据让它学习。总的来说，人类创造的人工智能如今能达到这个地步，与数据分析学科的一步步进阶是分不开的。要想在AI领域有所建树，学习数据分析是必由之路。

数据分析不仅仅是人工智能的基础，它现在还被运用于各个领域。我们正一脚跨入的这个人工智能时代，数据无处不在，不仅仅科技领域带来了大数据，商务世界也每天都在产生海量数据——金融领域利用数据对风险进行管控，外贸领域利用数据对买卖双方信用进行考察。日常生活中处处有数据，手机时时有大数据推送，上网买书时有网站的推荐系统，看足球比赛时有实时数据统计。了解数据分析的简要历史，能让你轻松愉快地走近数据分析的世界。

数据分析和科学是分不开的，它一直辅佐着科学的发展，伴随科学成长。我们回顾历史，人类科学史上历经三个阶段：被动地接受大自然赐予的一切并且探索客观规律；研究信息并且用仿真模拟探索自然；研究主观世界和人工智能。这三个阶段科学和数据分析是保持同步的。

统计学家拉奥曾经说过：“在终极的分析中，一切知识都是历史；在抽象的意义下，一切科学都是数学；在理性的世界里，所有的判断都是统计学。”对于数据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统计学，《数据分析简史》一书将数据科学三个最重要的历史阶段和两次统计学革命娓娓道来。从文艺复兴起在距今500多年的历程里，数据科学领域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才俊，从天文学家开普勒、神秘的牧师贝叶斯，到模糊数学开创者扎德、分形几何大师芒德布罗，他们所开创的天文数据统计、主观概率、分形统计……从不同角度对标准统计学作出了突破。最后就到了如今的时代，统计学习一起为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打下了基础。

《数据分析简史》中所举的例子多是轻松的话题，比如世界杯、房价、股市、旅游、婚恋等。书的正文以故事为主，数学概念和公式集中放在了每章末尾的注释中。没有专业数学知识背景的读者可以选择跳过注释部分，轻松读懂本书，而对具体数学推导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又可以在注释中解惑。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各国竞相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出台鼓励政策。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

《数据分析简史》在此时代问世，也算是做了一点微末的科学普及的贡献。



三味书屋



《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
《香料在丝绸的路上浮香》
许肇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全新跨文化》作者杰里·本特勒眼里，从古至今，跨文化互动对所有卷入其中的人们产生的重大影响涵盖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确，这得到了许肇先生新著《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香料在丝绸的路上浮香》的验证。他用以形容丝绸之路开通后物质往来交流盛大景况的“慕风远飏”一词，是何等恰切，且动感和画面感兼具——沿着这两本书溯源而上，可以稽考千年古卷，寻踪古代中国、罗马、埃及、巴比伦的浮香迷影，抑或逡巡于包罗万象的“纸上植物园”，续写东西方文明异来我往的流彩之诗。

试想，如果没有这些异域物种的输入和糅合，包括衣、食、住、行、医等在内的生活和文化谱系将会失去几多趣味和光彩。外来的“胡”，与中国本土早就有的“椒”相结合，便诞生了已成为厨房必备调味品的“胡椒”，并催生出新的菜肴

慕风远飏，丝绸之路上穿行的植物和香料

潘飞

烹制方法，甚至是“椒房之乐”。外来的小麦，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食品品类，还赋予其发明“来”字的灵感。石榴被赋予了“若榴”“丹若”“金罽”“天浆”等各有趣味的异名，延伸出“多子多福”的暗喻，“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典故更平添了几许风流意象。成语“天花乱坠”中的“天花”原指曼陀罗花纷纷坠落的奇异景象，从褒义词向贬义词的转变，不知其中发生了怎样理解上的转向？黄瓜虽有“绿色”之实，却无“绿瓜”之名，尤其是在汉族和其他民族统治时期，南方人和北方人的著述中，“黄瓜”和“胡瓜”之名轮番上场，背后折射出的幽微心理耐人寻味。

古代中国人洞悉枣椰树在其他民族神话谱系中的象征含义，用“千年枣”的本土化名称延续“不死鸟”菲尼克斯复活和永生的语义，有力佐证了全世界的神话体系同源，但又加以本土化改造，令其符合本土语义和习俗。甘蔗自印度传入中国，智慧的中国人发明出高级的制糖法，又反哺印度，说明各大文明从古至今从未间断的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多元的。中国药药的药用价值以及充当爱情信物的功能都随着花的本体一并传播到古希腊，被冠以“无刺的玫瑰”，化身为赠别之名。

丝绸之路既名为“路”，必然四通八达，经由这条路传播的植物、香料以及它们代表的文化，可以进入正史、药典、小说、民俗、成语、神话、诗词、图画……它们不仅“入土”，更能“入心”。比如，在西

方寓意自恋的水仙，到了中国，不仅多了“玉玲珑”“金盃银台”这样极美的别称，还变成幸福和幸运的象征，也算是中西“花语”的一种承接。在许肇看来，《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收录的宋代苏汉臣所绘《捣妆仕女图》中妆奁上的那瓶水仙，隐晦将中外不同时空的两种“自怜”悄然连接，产生一种“回声般的遥远呼应”。

可以这么说，经由丝绸之路流散的植物、香料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是贸易的，也是文化的。比如，传入中国的苏合香还繁衍成舞蹈和曲名，抑或被诗人们写入唐诗，字字珠玑，香清益远，就连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间沾染着龙脑香的丝巾，由“旃檀”化身而来的“檀郎”“檀口”之称，也给世人平添了几分香艳和风流余韵。由合欢花衍生而来的“合欢讎忿”一词以及文化谱系中以“合欢”命名的物件，都让人对美好的爱情产生了无穷的渴望。总之，外国香料的传入，丰富了中国人自《诗经》《楚辞》《山海经》有记载以来关于用香的文化习惯，让中国人的“芳香生活”变得更高贵。

外来的物种，因其奇异引发了众多文人的灵感，从而创作出优美的咏物作品，给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库平添了几多“奇葩”。在唐诗等文学作品助力下，外来植物和香料在中国本土衍生出的生态景观，愈加充盈着兼容、灵动的文化内涵。尤其是当外来植物遭遇唐代文学，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原来的形貌，被赋予诗意的审美、诗化的气韵，中国的风

韵，在唐人眼中和心中“走”过后，就不再是无意识的“野蛮生长”的“生物移民”，而是被人格化的、有情有义的“人文载体”和“文化喻体”，焕发出别样的光彩。比如，唐诗中的石榴、石榴红被用来比喻它物，延伸了石榴的语义；纵然千年逝去，今天的我们也能从苜蓿这样代表唐朝国力的象征符号的相关诗句中，感喟于那份海纳百川的大国气象。

不过，中外物种在传播过程中也会出现偏误。除了大蒜、番红花等物品的输入被“张骞狂”的追随者们归为张骞的功劳，欧洲人误以原产于中国的杏的产地为亚美尼亚，冠以“亚美尼亚李子”的名称。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这属于传播链条中的“噪声”，并不影响整体的传播效果。除此之外，杏被人格化和美誉化，且出现了两极分化——“杏林春暖”成为董奉那样具有高尚医风的名医的代名词；但同样以杏喻人，中国的“红杏出墙”则隐含讽刺和负面之意。最初被贵族用来祭献神灵、供神灵欢娱的香料，也随着传播而被“祛魅”，由“神界”而至“人间”，从奢侈品变成日常用品，给普通人的生活增添了别样的烟火气。丁香和豆蔻的繁盛贸易背后隐藏着利益至上的殖民者近乎疯狂的掠夺，和对“香料群岛”原住民的大肆屠杀。辩证地看，“香料之路”的香气不能掩盖人类文明史上的血腥味，殖民者的原罪也将永远受到拷问和审判。

在充满财富、新奇、传说的丝绸之路